

日漢琉漢對音與明清 官話音研究

丁 鋒 著

中 華 書 局

目 錄

第一章 漢語對音學與日漢、琉漢對音資料研究	(1)
1.1 漢語對音學與日漢、琉漢對音	(1)
1.2 日漢對音資料和琉漢對音資料	(4)
1.21 日漢對音資料	(5)
1.22 琉漢對音資料	(14)
1.3 日漢、琉漢對音資料的研究價值及對音研究方法	(19)
1.31 日漢、琉漢對音資料的研究價值和對音漢語的方言 分布	(19)
1.32 日漢、琉漢對音資料的漢語音韻研究基礎	(22)
1.33 日漢對音資料漢語音韻研究的方法和過程	(26)
1.4 日琉中近代音概述	(33)
1.41 日語語音史與方言	(33)
1.42 琉球語語音文獻與首里地區語音	(37)
1.43 漢語明清官話語音	(41)
第二章 明會同館編《日本館譯語》的漢語對音	(55)
2.1 明會同館與丙種本《華夷譯語》中的《日本館譯語》	(55)
2.11 會同館與所屬日本館、琉球館	(55)
2.12 丙種本《華夷譯語》與《日本館譯語》《琉球館譯語》的 成書時代	(57)
2.2 《日本館譯語》的版本和先行研究	(60)
2.21 《日本館譯語》的版本	(60)
2.22 先行研究	(64)

2.3	《日本館譯語》的音義釋讀	(66)
2.31	寄語的音義釋讀	(66)
2.32	各對校本之特點	(95)
2.33	寄語反映的日語語音特點和記音反映的寄語調查 情景	(96)
2.4	《日本館譯語》的對音所反映的漢語語音	(100)
2.41	對音表	(100)
2.42	聲母	(101)
2.43	韻母	(106)
2.44	漢語對音音系及其特點	(115)
第三章	明會同館編《琉球館譯語》的漢語對音	(122)
3.1	琉球王國重用通事的對明外交與《琉球館譯語》的成書 過程	(122)
3.11	朝貢・冊封的琉明關係與琉球重用通事的國策	(122)
3.12	《琉球館譯語》的成書及與《日本館譯語》的關係	(125)
3.2	《琉球館譯語》的版本和先行研究	(129)
3.3	《琉球館譯語》的音義釋讀	(130)
3.31	寄語的音義釋讀	(130)
3.32	對校本之特點和寄語反映的琉球語語音特點	(161)
3.4	《琉球館譯語》的對音所反映的漢語語音	(162)
3.41	對音表	(162)
3.42	聲母	(164)
3.43	韻母	(167)
3.44	漢語對音音系及其特點	(172)
第四章	明代四種《使琉球錄・夷語》的漢語對音	(176)
4.1	陳侃、高澄《使琉球錄》的成書及其寄語	(176)
4.2	《陳錄・夷語》與《琉球館譯語》的關係及“夷語”的音義 釋讀	(178)
4.21	《陳錄・夷語》刪減《琉球館譯語》並改訂其對音字	(178)

4.22	《陳錄·夷語》的音義釋讀及版本與經改訂對音字的特點	(182)
4.3	《陳錄·夷語》的對音所反映的漢語語音	(202)
4.4	郭汝霖、李際春《重編使琉球錄》的成書及其寄語	(206)
4.41	《重編使琉球錄》及其作者和版本	(206)
4.42	《郭錄·夷語》與《蕭錄·夷語》《夏錄·夷語》及劉孔當《海篇心鏡》等明代通俗字書所附“夷語”	(207)
4.5	《郭錄·夷語》與《陳錄·夷語》的關係及《郭錄·夷語》的音義釋讀	(209)
4.51	《郭錄·夷語》改訂《陳錄·夷語》的成書過程	(209)
4.52	《郭錄·夷語》的音義釋讀及其琉球語特點	(210)
4.6	《郭錄·夷語》的對音所反映的漢語語音	(231)
4.61	對音表	(231)
4.62	聲母	(232)
4.63	韻母	(234)
4.64	漢語對音音系及其特點	(236)
4.7	明代四種《使琉球錄》所記敘的琉球語言使用現狀和通事活動	(238)

第五章 清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錄》所收“土音”“字母”“誦聲”的漢語對音 (243)

5.1	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錄》的成書及其寄語	(243)
5.11	《琉球入學見聞錄》及其作者	(243)
5.12	《琉球入學見聞錄》的琉漢寄語與《中山傳信錄》的“字母”“琉球語”	(244)
5.2	《琉球入學見聞錄》所收“土音”“字母”“誦聲”的音義釋讀	(245)
5.21	“星土”地名寄語釋讀	(245)
5.22	“字母”對音的釋讀	(247)
5.23	“土音”寄語的釋讀	(248)
5.24	“書籍”對音的釋讀	(265)
5.25	“誦聲”對音的釋讀	(266)

5.26	《琉球入學見聞錄》的琉球語特點	(272)
5.3	《琉球入學見聞錄》的對音所反映的漢語語音	(273)
5.31	對音表	(273)
5.32	聲母	(275)
5.33	韻母	(280)
5.34	漢語對音音系及其特點	(285)
第六章	清李鼎元《琉球譯》所收寄語的漢語對音	(289)
6.1	李鼎元《琉球譯》的成書及其寄語	(289)
6.11	琉漢對音字書《琉球譯》與《球雅》之謎	(289)
6.12	李鼎元及《琉球譯》的版本	(293)
6.2	《琉球譯》所收寄語的音義釋讀	(294)
6.21	音義釋讀	(294)
6.22	《琉球譯》的琉球語特點	(417)
6.3	《琉球譯》的對音所反映的漢語語音	(418)
6.31	對音表	(418)
6.32	聲母	(422)
6.33	韻母	(429)
6.34	漢語對音音系及其特點	(435)
第七章	清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所收寄語的漢語對音	(439)
7.1	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的成書及其寄語	(439)
7.11	傅雲龍其人及《遊歷日本圖經》的版本	(439)
7.12	《遊歷日本圖經》的日漢對音寄語	(440)
7.2	《遊歷日本圖經》所收寄語的音義釋讀	(442)
7.21	音義釋讀	(442)
7.211	“方言”的寄語釋讀	(442)
7.212	“日本文表”和“五聲十五韻新譜”的假名對音 釋讀	(459)
7.213	“日本異字”下日本自製漢字的對音釋讀	(465)
7.22	《遊歷日本圖經》裡的日語江戶音特點	(466)
7.3	《遊歷日本圖經》的對音所反映的漢語語音	(467)

7.31	對音表	(467)
7.32	聲母	(468)
7.33	韻母	(474)
7.34	漢語對音音系及其特點	(476)
結語(代跋)		(480)

第一章 漢語對音學與日漢、 琉漢對音資料研究

1.1 漢語對音學與日漢、琉漢對音

漢語音韻學具有悠久的文獻歷史和深遠的學術傳統。爲了傳達和記錄漢語語音，漢民族的祖先們在先秦時代就重視語音的描述，並開創了直音法，以漢字直接標示另一個漢字的未知語音。直音法來源於日常生活，雖然樸素簡單，但它開創了中國古代數千年來以漢字記錄漢字音的先河，給漢語音韻學帶來第一縷曙光。

漢代以降是漢語音韻史上自我更新、接受啟蒙，繼而醞釀形成的時代。佛教東傳給長久以來自生自爲的漢語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契機，在佛典的翻譯鑽研及浸染膜拜中，中土的生民際遇了一種新的人生哲學，也際遇了一種新的語言類型，獲得語際對比和語言分析方法的啟迪。從兩漢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的近千年中，反切以及以反切群爲中核的韻書相繼誕生，進而以韻書的小韻代表字群爲核心縱橫排列的韻圖也走上歷史舞臺。至此，以反切爲字音基礎、以韻書韻圖爲音系基礎、以聲韻調爲分析對象的漢語音韻學構架得以完成，爲後來古音學、今音學、等韻學、北音學、對音學的興起和學系形成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對音學主要通過研究一種語言與其他語言的對照性語音記錄來探討兩種語言的語音狀況，漢語對音學則主要研究漢語與外語的語音對照材料^①，從語音對應中探究語料所屬時代區域的漢語語音實際和音系狀況，以豐富漢語音韻學、漢語語音學的研究成果。

^①外語，指漢語之外的語言，包括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

漢語對音學作為一個學科起步甚晚，若以上個世紀 20 年代前後銅和泰《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1923)、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1923)、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馬伯樂《唐代長安方言考》(1920)、稍後羅常培《知徹澄孃音值考》(1931)和《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王力《漢越語研究》(1939)等中外學者的研究為開端標志的話，還不到一百年。

但漢語對音學用來作為研究對象的對音史料的形成是非常久遠的，可以上溯到兩千年前佛典漢譯的最初階段。先秦兩漢時代文獻中的漢語外來詞也可以說是漢外對音的最早體現，對音（音譯或語音對應）作為一種不同語言對譯的日常手段和有效方法，源遠流長。其方法原理與同樣使用漢字的直音法雖然各呈秋色，但實際上異曲同工。

對音學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和方法論。其研究價值在於“在把本國的音類弄清楚以後，能夠參照用音標所寫的對音，那實在是打破讀音‘玄關’的一個秘鑰”^①。對音研究追求音值的釋讀和考究，其注重追求語音真實的研究過程突破了傳統音韻學以反切用字為音類基本單位，以韻書韻圖的小韻為音節基本單位，即處處以超語音超方言的漢字為基本符號的局限，具有就語音研究語音、直觀直感、就事論事的長處，對音學方法是研究語音史值得肯定和推崇的行之有效的方

法。但對音學的研究不是萬能的，相反，因為對音研究面臨語種譜系的判斷、作者版本的考證、時代地域的把握、兩方語言的洞察、語音解讀的確證、對音性質的釐定、漢語對音的檢驗等研究工序中各種不可避免的複雜問題，對對音研究科學性、嚴謹性的要求程度應該高於其他音韻學研究方法，這樣纔可期其應有的學術價值。

對音學上的對音或叫譯音對勘。“對”是雙方的，對音史料有雙向性，既可以用外語記錄漢語，也可以用漢字記錄外語，兩類材料都可以通過解讀，達到研究漢語（另一種語言亦然）語音的目的。對音材料根據製作過程和狀態有多種類別。注音類如《蒙古字韻》的八思巴字對音，以甲語言的文字為乙語言的文字注音，是文字對文字的。譯音類如漢譯佛經中的咒語和音譯詞，以甲語言的文字譯寫乙語言的詞句，是語句對語句的。借音類如日語中的吳音、漢音、唐音，將甲語言的語音經適合於本語言語音特點的改造後借用到乙語言中，是借音又借字（字形不變）的。記音類如多種《華夷譯語》中的漢外對音資料，屬於甲語

^①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p1。

言記音人用本語言的文字筆錄乙語言發音人的語音，是授受同場、訴諸口耳的。各種形式的對音材料在表現語音的真實上有些高下，但都具有其獨特的研究價值，如實把握資料的長短得失，因勢利導地展開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漢語對音學領域的研究在這數十年間有長足的發展。許多沈睡千年的對音文獻和海外收藏的對音文獻得以發掘，受到學界的極大關注，得到很好的研究。至今，對音學研究方法愈趨完美，研究角度愈趨多樣，研究成果愈趨豐富，外漢對音研究也由早期的梵語和漢語^①、日語和漢語、藏語和漢語、越南語和漢語，發展到今天又包括朝鮮語和漢語、西夏語和漢語、吐火羅語和漢語、巴利語和漢語、突厥語和漢語、回鶻語和漢語、波斯語和漢語、蒙古語和漢語、琉球語和漢語、滿語和漢語、阿拉伯語和漢語、比利時語和漢語、葡萄牙語和漢語、意大利語和漢語、暹羅語和漢語、緬甸語和漢語、歐洲各語言和漢語等方面^②，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本書的研究屬於日漢對音的範疇，但是與高本漢先生《中國音韻學研究》利用日語漢字音考證漢語音韻所採用的材料不同。日語漢字音材料屬於上文所述借音類，本書研究的文獻多數屬於記音類，間或也有注音類的。記音類的文獻是記音人和被記音人在面對面的情形下記錄完成的，與現代方言調查的過程相似。其本於唇吻、求真如實的獨善之處所體現的研究價值，既不同於也遠遠高於經過借入方語言沖洗過濾的借音類材料。

“琉漢”的“琉”指琉球語。“琉球”（本寫作“流求”）作為國名，最早出現於《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卷內所志風土語詞，與今所稱琉球大異，其實無

①外漢對音，或可稱漢外對音。聶鴻音《番漢對音簡論》（《固原師專學報》1992年第2期）一文“把針對漢語和外民族語言音譯材料對勘的研究方法稱為‘番漢對音’”（引自孫伯君2005，見下文）。孫伯君《胡漢對音和古代北方漢語》（《語言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把用漢語為北方少數民族語記音的資料統稱為胡漢對音資料，其對音稱胡漢對音。

聶鴻音在《番漢對音和上古漢語》（《民族語文》2003年第2期）一文中從早期佛教堅決反對使用婆羅門語言梵語的史實出發，主張初唐“以前幾百年的漢代佛經譯音”不宜稱梵漢對音。

②這裡的“歐漢對音”與前述幾個個別歐洲語言與漢語的對音不同，主要是指清代漢語和主要包括英語、法語、德語、荷蘭語等西歐各語種語言文字的對音，不僅限於譯音詞彙集材料，與明清兩代乃至民國時期因歐洲語言形成的漢語外來詞研究也有深切的關聯。這種研究目前在日本發展很快，成果甚多。

對音資料的研究在名稱上因為一個語種有古今區別，又在冠名上有統稱和具稱的出入，內涵有時互相包含。

考。有明承祚，遣使宣諭通好^①，遂號“琉球”。琉球之地，自古即稱“沖繩”，為日本本島以南擁有數十個小島的島國。琉球國與明清通好越五百年，直至為日本吞併，明治八年(1875)結束國交^②。琉球語(或稱古代沖繩方言)是日語的一支，所以廣義上說琉漢對音屬於日漢對音也是正確的。因為日本本土使用的一般意義上的日語與琉球國使用的沖繩方言差距非常大，資料性質也不同，為敘述方便起見，本書將日漢和琉漢分開表述，以清眉目。

日漢、琉漢對音資料所存有二十多種，蔚為大觀。雖然長期以來有許多日本學者對它們作過程度不同的資料解讀、日語研究、索引編輯的工作，但對其中漢語對音的研究，還非常稀少，成果寡然，系統的研究就更談不上了。筆者旅日問學十五載，十三年前開始涉足此領域，相繼發表有關論文二十多篇、專著兩種。本書所涉及的文獻研究和對音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首次在中國亮相的。筆者妄逞集大成之志，力求盡可能全面詳盡研究所有有關日漢、琉漢文獻，以饗學界。不求有功，但求少過。唯期冀這一新的研究領域得到更多同道好友的關注和知遇，這對歷史上曾經汲汲於記錄日語、琉球語，留下如此珍貴日中文化交流遺產的中日先人們來說也是一種慰藉和回報罷。

1.2 日漢對音資料和琉漢對音資料

日漢、琉漢對音資料是用漢字及其所具有的發音對應性地記錄日語，包括句子、短語、單詞、漢字和假名的發音的歷史語料。如“極好人 一蓋逆目搖革許多(いかにもよかひと ikanimoyokahito)”^③、“不曉得 失藍(しらん shiran)”、“馬 烏馬(うま uma)”、“萬 滿(man)”、“に 尼(ni)”。假名在資料中或稱夷字、番字、土字、字書、字母、國字、國書、日本文、琉字、球字等，語句則稱寄語、夷語、土語、土名、土言、方言、國語、球語、球音、球名或日本語、琉球語等。一般說，明代以前稱呼較卑，清代以後稱呼較尊，也漸科學。這投

①據《明史稿·外國列傳·琉球》，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遣行人楊載“以即位建元詔告其國。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隨載入朝，貢方物”，為中琉邦交之始。

②在此之前，日本已將琉球國改稱為琉球藩，但琉球繼續維持與清朝的國家交往。明治八年(1875)六月，明治政府向琉球藩發出通告令，廢止向清朝派遣使節和接受清朝的冊封。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廢藩置縣”，琉球藩遂被改為沖繩縣，沿襲至今。

③空格前為漢語義，空格後為代表日語語詞或假名讀音的漢字，括號內為日語假名形態和日語羅馬字音。

射出在明清人眼中日本和琉球由夷國轉向鄰邦甚至是先進國家的意識進化。“寄語”一詞源於《周禮·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南曰寄。”意為東南外域語言之譯語。因日漢、琉漢對音文獻和日本學術界普遍使用它來表示日漢、琉漢對音語詞，本書沿用之。

1. 21 日漢對音資料

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民間的交往接觸可以上溯到遠古時代^①。以《漢書·地理志》所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和《後漢書·東夷列傳》所記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為開端的話，兩國間有兩千多年的交往史。兩千多年來，廣泛多邊的文化交流給後人留下豐富而珍貴的歷史文獻，多種日漢對音文獻是其中具有特色、彌足珍視的組成部分，是日中語言交流的結晶。

日漢對音資料有十數種，可以分為三個歷史時期：

第一個歷史時期是明代以前，與日中交通和日本赴中國留學僧侶的活動有關。

(1) 唐以前史書所載音讀日本地名人寄語

二十四史自《漢書》始記日本事情。自《漢書》至《隋書》均稱日本為“倭”或“倭國”。《舊唐書》或以為倭和日本為兩個國家^②。《新唐書》始不再稱倭，唯稱日本^③，後世沿之。在文字文明方面，《隋書·東夷列傳·倭國傳》言“(倭)魏時譯通中國……無文字，唯刻木結繩”。《舊唐書》言“頗有文字，欲效佛法”。《宋史·外國七·日本國》首次詳細記載日本天皇年代年號和地域名稱，對日本方有如實的記載。這與日本派出遣隋使遣唐使赴中國學習，大量吸收中華文化，急速開化發展，利用漢字，進入有史時代有深切的因果關聯。

①日本的陶器文化、水稻栽培、金屬使用、航海技術多受中國影響，其時代可以上溯到日本的繩文時代(約前 10000 年到約前 300 年)和彌生時代(約前 300 年到約 3 世紀中葉)。當時的中國文化多經朝鮮半島進入日本，間或從海上直達日本。1980 年山東半島龍山文化出土的梗稻遺物與日本繩文文化遺址出土的梗稻遺物相同，其年代為公元前 2400 年(見《史前研究》1984 年第 3 期《山東棲霞楊家園遺址發掘簡報》)。

②《舊唐書·東夷列傳》：“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

③《新唐書·東夷列傳》：“日本，故倭奴也……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

二十四史的日本寄語記載與上述情況同步。唐以前史書中多出現的音讀日本地名^①、人名，唐以後基本絕迹。其原因是唐以前日本尚無文字，中國史官祇能憑發音用漢字音記所言所聞日本人名地名；唐以後日本普遍採用漢字，與中國交往時，徑用漢字，不再需要用漢字記錄日語讀音了。

正史中載有日本音讀人名地名的主要有《後漢書》《三國志》《隋書》三種。《後漢書·東夷列傳》有邪馬臺(地名)，《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有狗邪韓、一大(支)、末盧、伊都、不彌、投馬、邪馬壹、斯馬、已百支、伊邪、都支、彌奴、好古都、不呼、姐奴、對蘇、蘇奴、呼邑、華奴蘇奴、爲吾、邪馬、巴利、支惟、烏奴、狗奴、伊都(以上國名地名)，卑狗、卑奴母離、爾支、泄謨觚、柄渠觚、兕馬觚、卑奴母觚、多模、彌彌、彌彌那利、伊支馬、彌馬升、彌馬獲支、奴佳靺、狗古智卑狗、壹與、卑彌呼、伊聲耆、掖邪狗、卑彌弓呼、載斯、烏越、難升米、牛利、掖邪狗(以上官名人名)，《隋書·東夷列傳·倭國傳》有邪摩堆(地名)、阿每、多利思比孤、阿輩雞彌、雞彌、利歌彌多弗利(以上人名)、伊尼翼、軍尼(以上行政單位)等六十多個。

這些人名地名因記載日本史前史事情，雖難以實證，但其對音特徵確爲以開音節爲主的日語，其研究成果對研究日本史前史、史前日語和1到5世紀的漢語音韻都有不可忽視的意義。此外，其他相關史書中或有零星日語寄語，亦有研究價值。

(2)《鶴林玉露·日本國僧》所記日本寄語

《鶴林玉露》十六卷，筆記體著作，南宋廬陵(今江西省吉安)羅大經(1193—?)撰。其卷四“日本國僧”條記有採集於日本留學僧安覺良祐的日語寄語二十個，爲日漢對音記音類材料中年代最早、記音人和發音人也明確可考的稀有文獻。

(3)《書史會要·外域·日本國》所記日語假名和寄語

《書史會要》(1376)九卷，書法學專著，元明之際浙江黃岩(後移居江蘇松江)陶宗儀(1316—約1396)著。該書卷九“外域”記諸外國文字，其中“日本國”條下言“於宋景德三年，嘗有僧入貢，不通華言，善筆劄，命以牘對。名寂照，號圓通大師”^②。又言“彼中自有國字，字母僅四十有七，能通識之便可解其音義，因索寫一過”。下依日本“伊呂波”假名歌順序列國字(日語假名)四

^①不包括唐代。

^②《宋史·外國七·日本國》亦記寂照事迹，內容相仿。

十七個^①，旁書對音漢字。間或注以又音，如“又近移”“又近排”；或說明聲調，如“平聲”；或說明發音，如“縮舌呼”“作喉音呼”“聲彈舌”等，這些描寫精細入微，是考據對音的重要根據。假名歌後列舉了十個漢語詞的日語假名寫法。《書史會要》所收不論是假名對音，還是以假名記日語詞都屬中國最早先例，具有特殊的認識意義。

第二個歷史時期是明代，其資料集中於明代中後期的 16 世紀嘉靖、萬曆年間，多與中國軍民記錄、學習和研究日語，以抗倭禦敵有關。

(4)《日本國考略·寄語略》所錄日本寄語

《日本國考略》或稱《日本考略》，一卷，明浙江定海人薛俊撰，初版於嘉靖二年(1523)。《日本國考略》分十七“略”，介紹日本的地理、行政、區劃、人口、風俗等國情，描述倭寇的進犯狀況和路線，提出防禦策略。該書受府縣之命，為抗倭而作^②。卷中“寄語略”分天文、時令、地理等十五門，收寄語三百六十三條。《日本國考略》為最早的抗倭著作之一，其內容在成書後數十年中多為同類著作承襲徵引，收入其中寄語的著作有以下幾種，影響可謂深遠。

《日本圖纂·寄語雜類》(1561 年)

《籌海圖編·寄語雜類》(1562 年)^③

《登壇必究·東倭·寄語雜類》(1562 年)

《全浙兵制考所附《日本風土記》卷四“寄語”的最後一百五十多條(1592 年)

《倭情考略·倭語》(1597 年)

《武備志·四夷·日本考·譯語》(1621 年)

《玄覽堂叢書續集·四夷廣記·朝鮮^④廣記·日本寄語》(明,年代未詳)

①“伊呂波”是日語平假名い(i)ろ(ro)は(ha)的漢字來源書寫方式。把日語五十音圖內的假名編成有意義的詩，便於記誦，前三個假名即“伊呂波”，猶如西方二十六字母的 ABC，故以此為日語假名歌的名稱。

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三十四·地理類存目七《日本考略》云：“嘉靖二年，日本國使宗設來貢，抵寧波。未幾，宋素卿等亦至，互爭真偽，自相殘殺。所過州縣，大肆焚掠。浙江瀕海之地，人民苦之。俊因纂輯是書，大略言防禦之事為多，而國土風俗亦類入焉。”《明史·外國列傳三·日本》亦詳細記載事端始末。《日本國考略·寄語略》的識語云：“故特寄其常所接談字，仿佛音響而分擊之，以資衛進將士之聽聞，亦防禦之一端也。”

③上述兩種為同書異名之作，詳見後文說明。

④“朝鮮”二字應為“日本”之誤。

《龍威叢書》第九集《八紘譯史》收十幾條(1683年)

以上八種,除第四、八種是節錄或零星例錄之外,其餘五種都保留原書的大體面貌,僅在用字上有些出入,可供校讎辨誤。

(5)《日本圖纂》和《籌海圖編》所收地名寄語和島名寄語

《日本圖纂》,明江蘇崑山鄭若曾為補《日本國考略》不足而作,嘉靖四十年(1561)以單行本刊行。該書“寄語雜類”所收日本寄語完全承襲《日本國考略》,獨特的部分在“日本紀略”中收日本地名寄語一百四十多個,“寄語島名”部分收日本地名、島名寄語八十餘個。這些名稱多可深入考證,既是研究鄭氏對音,又是研究日本地名史的好資料。

鄭若曾在《日本圖纂》編成的次年(1562),又完成《籌海圖編》十三卷,兩書內容雷同處很多,寄語亦大致相同。又天啓四年(1624)《籌海圖編》重刊本題胡宗憲作^①,非為事實。稍後出版的《登壇必究》《武備志》《四夷廣記》《皇明馭倭錄·寄語略》亦沿襲其書,收有地名島名寄語,可資比較。《武備志》對音字多有改動,其獨特的部分值得注意。

(6)《日本一鑒·窮河話海》“文字”“寄語”所收假名歌對音和寄語

《日本一鑒》十六卷,各卷首題“奉使宣諭日本國新安郡人鄭舜功敘編”^②。鄭舜功嘉靖三十四年(1555)受浙江總督楊宜之命奉宣諭日本國^③,傳達明朝共同制倭意旨,並偵察倭情。次年五月啓程,六月漂至日本豐後,謁見豐後守源義鎮,留滯半年後歸明之際,因楊宜已失勢,與同行的日本臨濟宗大德寺和尚清授因誣被拘,謫於四川茂州治平寺。《日本一鑒》為謫居期間,在清授協助下完成的。書以寫本傳世,無序跋,從記載內容看,成書應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以後。

^①胡宗憲,《明史》有傳,字汝貞,號梅林,安徽績溪人,嘉靖戊戌(1538)進士,歷任浙江巡撫、右都御史、太子太保,督師抗倭寇有功。後為人讒害,屈死獄中,終復得封諡。鄭若曾曾為胡宗憲幕僚,故胡宗憲可將鄭原作另更己名再版。

^②據《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史為樂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隋大業三年(607)改歙州置,治所休寧縣(今安徽休寧縣東萬安)。十三年(617)移治歙縣(今安徽歙縣)。轄境相當今安徽省南部新安江上游流域及祁門縣、江西婺源縣地。唐初復改為歙州。天寶元年(742)改為新安郡,乾元元年(758)又改為歙州。後世因以新安為歙州、徽州所轄地之別稱。南宋羅願《新安志》即此地的志書”。從對音反映的方言特點和歷史地名使用習慣及其他因素來看,此處“新安郡”應為隋唐所置今安徽之新安郡。

^③楊宜,《明史》有傳,衡水(今屬河北)人。官河南巡撫,後昇南京戶部右侍郎,旋任抗倭總督。因遭排斥,久無功,在任僅半年。

《日本一鑒》的日漢對音資料包括《窮河話海》卷四“文字”和卷五“寄語”。“文字”簡述日本文字語音情況，下列“伊呂波”順序“華文倭字”“倭字倭”^①“倭字草書”和“草書字末”，是研究日漢假名對音和假名形體、書體不可多得的依據。卷五“寄語”首先略述寄語沿革及書中寄語記錄所用方法，後收對音語詞三千四百餘條。卷中假名對音字率用“倭字倭(音)”下同樣的假名對音漢字，所謂“倭字四十七數，以志華文，調定寄音，翻譯具備”。這種以一漢字對一假名的方法屬於注音類對音，雖有簡省明瞭的長處，但缺乏記音類假名的口語鮮活性，研究價值有限。

(7)《全浙兵制考》所附《日本風土記》中的寄語與歌詞對音

《全浙兵制考》三卷附錄《日本風土記》五卷，舊題明侯繼高撰。繼高字龍泉，浙江金山衛(今上海金山區境內)人。書成於萬曆二十年(1592)。

《全浙兵制考》是一部地方軍事防衛著作，內容為全浙海圖和各府縣地圖、戰船火器與操伍圖、倭警始末等。所附的《日本風土記》內容迥異，第一卷記地理地名和刀器，第二卷記政治、朝貢、疆域、風俗，第三卷為字書和歌謠，第四卷記語音、時令氣候、人物用物，第五卷記文辭詩賦、山歌、琴法、棋格等，純然是記錄日本風俗物產、文學娛樂，充滿文人氣氛的風土記，行文上完全沒有抗倭的火藥味。該書雖然附於《全浙兵制考》之後，但作者絕非一介武將的侯繼高，而是另有其人。從《日本風土記》的諸項內容和時代背景來看，作者當是與日本文人有深交的寧波文人。

《日本風土記》裡的日漢對音資料非常豐富，包括：

①卷三“字書”、“以路法字樣”^②，列日語假名的對音漢字，並注明多種通用，為探討對音提供依據。

②卷三“歌謠”列三十九首各三十或三十多音節日本俗謠歌詞的對音。各首有曲名、漢字假名對應、呼音、讀法、釋音等部分，詳細解釋語音語義。

③卷四“語音”的“切音正舌歌”用七言二十四句詩體裁說明日語假名的發音。“寄語”分五十六類，收一千一百多條寄語^③。

④卷五“山歌”收日本民歌歌詞十二首，琴譜所附歌詞三首，其體例與卷三“歌謠”相同。

①疑“倭字倭”下脫“音”字。

②“以路法”為“伊呂波”的異稱。

③其中一百五十多條採自《日本國考略·寄語略》。

《全浙兵制考》及所附《日本風土記》出版第二年，當時身為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淮陽侯的李言恭和身為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的郝杰對原版略加削補，更書名為《日本考》，以二人名義付梓流布。《全浙兵制考》附《日本風土記》與《日本考》同書異名。

(8)《日本館譯語》所收寄語

《日本館譯語》作為外交機關編寫的外語教本，是明代唯一與抗倭無關的寄語資料。明代所修漢語與外語對音資料集《華夷譯語》有甲、乙、丙三種^①，約成書於弘治年間(1488—1505)的丙種本收各國譯語集十三種，《日本館譯語》寓其中。丙種本是唯一收有日漢對音集的《華夷譯語》。《日本館譯語》分十八門，收寄語五百六十多條。

《玄覽堂叢書續集·四夷廣記》的《朝鮮廣記·日本譯語》收《日本館譯語》全文^②，條目用字略有出入。《日本館譯語》雖為官編著作，語音亦屬官話，質量上乘，但轉錄的祇有此一種，這大概與《日本館譯語》作為禮部秘籍一直深藏不出有關。《四夷廣記》的編者為朝廷重臣王錫爵的門人吳興慎懋賞^③。該書能搜集編入禮部所轄會同館編的《日本館譯語》，近水樓臺，不足為怪。

(9)《四夷廣記》所收來歷不明的“日本寄語”

《玄覽堂叢書續集·四夷廣記》的“朝鮮廣記”下收“日本寄語·州島類”“日本寄語·寄語略”“日本寄語”和“日本譯語”等四種日漢對音資料^④，其中前三種分別取材於《日本圖纂》(或《籌海圖編》)、《日本國考略》和《日本館譯語》，最後一種“日本寄語”卷前自識曰：“此乃莆田知縣孫繼有聞之莆人劉懷春者，比前本迥異。蓋劉所居之島不同，猶閩之與浙，其聲音自不相通也。”以下分天文、時令等九類，收寄語一百三十六條，試以日語或琉球語解讀，均不可解。這個資料是漢語與其他外語的對音集，還是出於何人杜撰，尚待深入研究。

清代日漢對音資料集中在嘉慶到光緒的晚清時期，與國人研究、遊歷或求學日本以及日中貿易有關。

①此據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女真語研究的新資料》一文(《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1930)的分類。甲種本，明洪武十五年由火源潔、馬沙亦黑等編輯，收譯語一種。乙種本，明永樂五年四夷館修，收譯語十種。丙種本，明會同館編。

②⑤“朝鮮”應為“日本”之誤。

③王錫爵(1534—1610)，字元馭，江蘇太倉人。嘉靖進士，授編修，昇祭酒。後累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及為首輔。諡文恭，贈太保。

(10)《吾妻鏡補》“國書”“國語解”所收日語假名對音和寄語

《吾妻鏡補》三十卷，江蘇吳江翁廣平纂。各卷下書“一名《日本國志》”，《日本國志》為書之別名。全書在寫作時引用日漢著作一百八十七種，是“凡七閱歲五易稿”的苦心之作^①，書成於作者五十五歲的嘉慶二十年(1815)。

《吾妻鏡補》是在通讀日本大型史書《吾妻鏡》和其他著作後寫成的^②，故稱“補”。全書內容包括世系表、繪圖、地理志、風土志、食貨志、通商條規、職官志、藝文志、國語解、附庸國志等，一仿正史體裁。就是國語解亦是“遼金兩史俱有國語解，茲仿其例，作國語解三卷”^③，以正史為規範。

國語解三卷中“國書”為第二十六卷，其餘兩卷為《國語解》。“國書”收“伊呂波”順序平假名對音和片假名對音，二者用不同對音字^④。“國語解”標題下直書“本《海外奇談》”，下分十四類，收一般寄語和州名島名類寄語一千餘個^⑤。《吾妻鏡補》中所收多種寄語資料均非翁廣平所作，全部引自所參考的有關先行著作，其中多已失傳，值得重視。《吾妻鏡補》共有四種對音資料：

1. 張禹若《東洋客遊略》的“長崎町名”寄語，反映的是閩語語音。
2. 《海外奇談》的片假名對音和寄語，作者不詳，反映的是吳語語音。
3. 《日本夷譯語》的平假名漢字對音，作者居彥求，反映的大致為吳語語音。
4. 轉引自鄭若曾《日本圖纂》的日本地名寄語，反映的是吳語語音。

①《吾妻鏡補·自序》。

②《吾妻鏡》，亦寫作《東鑒》。“東”在日語中或讀あづま(adzuma)，與“吾妻”的讀音相同，因作異名。《吾妻鏡》為日本鎌倉時代(1192—1333)由鎌倉幕府編寫的幕府編年體史書，編於13、14世紀之交，記事自1180年到1266年。因原本散逸，卷數未詳，傳為五十二卷。江戶時代初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引《吾妻鏡》為治國之資用，積極收集殘本，於慶長十年(1605)輯成五十二卷本《吾妻鏡》出版。該書傳入中國的時代不詳。從清國子監琉球官學教習潘相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成書的《琉球入學見聞錄》卷首“採用書目”中亦有“日本東鑒，即吾妻鏡”來看，《吾妻鏡》在出版後的至少一百五十年之內已傳入中國，此時距《吾妻鏡補》成書約早半個世紀。

③《吾妻鏡補·凡例》。

④平假名對音部分題“本《日本夷譯語》四十八字”，片假名對音部分題“本《海外奇談》”。《日本夷譯語》，居彥求著。《海外奇談》一書，作者尚不明。

⑤靜嘉堂本“州名島名類”下旁注“國語解本《日本圖纂》，參海防類考”。下“長崎町名”注“本《東洋客遊略》”。《東洋客遊略》，作者張禹若。